

视的敌人，……以现时之‘讨伐部队’尚无法摧毁。”^①关东军公报二〇七期在报导军部反映时说：抗联“受共产思想的影响与日俱深，他们的活动带有执拗恶性，覆灭他们的巢窟，破坏政治匪，尤其是思想匪的组织，以期根绝匪祸，决不是容易的事情。”^②

历史已经证明，东北抗联在敌后坚持了十四年的长期游击战争，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它对于全国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最主要的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给日本侵略者以严重打击，箝制了敌人的军事力量，阻扰了敌人侵略计划的迅速实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同时，也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酷爱独立、自由，为维护民族尊严，英勇不屈，顽强战斗的精神与气概。“七·七”事变爆发后，抗联又从敌人背后进行侧击，有力地配合了关内的抗战。正象毛泽东同志所说：“整个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敌人，箝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和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都是战略上配合了正规战争。例如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未起以前当然不发生配合问题，但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箝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③

三、东北抗日英雄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实行武装侵略，国民党顽

① 《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第68页，辽东建国书社版。

② 见《东北的黑暗与光明》一书，第42页——43页。

③ 《毛泽东选集》袖珍一卷本第385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固派采取所谓“不抵抗”政策，听任日本占领整个东北。当时，中国共产党命令东北地区党组织坚持抗日斗争，并且派遣了许多优秀共产党员到东北地区来工作，杨靖宇、罗登贤、魏拯民、李兆麟、周保中、冯仲云等同志，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们忠实于党的革命事业，与东北各族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团结爱国力量，组织东北抗日武装力量，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给予侵略者以有力地打击。他们在斗争中表现了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任何敌人与任何困难面前决不低头的伟大气概和高尚的民族气节。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同志为此付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在中华民族解放史上谱写了惊天动地鬼神的人肺腑的篇章。

1 民族英雄杨靖宇

杨靖宇同志原名马尚德。一九〇五年生于河南省确山县李湾村。一九二三年考入河南省开封工业学校，后即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七年按党的指示离开工业学校到确山、信阳等地组织农民运动，同年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靖宇同志到洛阳、开封等白区做党的秘密工作，曾三次被捕，经受了各种酷刑拷打，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一九二九年党派他到东北，在满洲省委工作。在他任抚顺特别支部书记期间，被叛徒告密，又先后两次被捕。“九·一八”事变后，经组织营救出狱，被派往哈尔滨任反日总会会长、哈尔滨市道里区委书记，在工厂、铁路、学校、社会团体及近郊农村中，发动广大群众组织反日会，支援抗日义勇军，并动员工农青年和学生参军抗日。一九三二年春，靖宇同志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同年夏初，兼代中共满洲省委

军委书记。秋天，代表省委去南满巡视，整顿了沈吉铁路沿线各县的地方党组织和各游击队、反日会。当时以磐石蛤蚂河子一带为中心的南满游击队比较活跃。满洲省委为了加强这支游击队，准备把它建设成为党领导的坚强的抗日武装和南满抗日游击活动的核心，于是特意把靖宇同志派到南满游击队做政治委员。这支部队在靖宇同志的带领下，在永吉、伊通、双阳、磐石、东丰、西丰、桦甸、辉南、通化等地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当时，南满一带政治斗争形势很复杂，有很多“响马”出身的抗日山林队，靖宇同志对他们广泛地开展了团结、教育、改造的艰巨工作。他不畏风险，亲自去做说服工作，感动田麟、老长青、青林、天虎等人都愿接受杨靖宇的领导。一九三四年三月，靖宇同志为团结更多的抗日力量，着手组织抗日联合指挥部，给各抗日领导人写信，宣传党的统一战线主张，说服他们参加联合抗日组织，邀请他们参加会谈，并派出李红光、韩光等同志深入到这些抗日部队，进一步做宣传动员工作。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二十多名各种旗号的抗日军领导人齐聚在濛江县陈家砬子开会，大家一致拥戴杨靖宇同志为总指挥。

杨靖宇同志是一个出色的军事指挥员。他善于发现敌情，掌握敌人弱点，从不放松有利战机，灵活运用游击战术，主动出击敌人。靖宇同志率领一路军战士，活跃在南满，成为威震东北的一支铁军。关东军对杨靖宇十分惧怕，抬出汉奸邵本良，要与杨靖宇见个高低。邵本良原是胡匪头出身，当过东北军团长，“九·一八”事变投降日军成了日伪军的团长，不久封为东边道的少将“剿匪”总司令，是日军最得意的一只咬人的恶狗。靖宇同志用调虎离山的办法，先把邵本良的主力部队从三源浦调出去，趁空虚，一个偷袭打进去，全歼了邵本良一个连和警察公署，破坏了铁路工程局，烧毁了伪军的营房。等邵本良发现上

当，把主力开回三源浦，杨靖宇率领部队已走得无影无踪。邵本良不甘心失败，他得知抗联东向通化、临江转移时，扬言要派通化驻军堵截。杨靖宇同志也将计就计，把部队转向柳河。正当邵本良派两个团向柳河增兵时，杨靖宇又连夜带队行军一百二十里，掉转头来，突进了凉水河子，把邵本良的后勤基地一下敲掉了。接着，杨靖宇佯攻柳河，吸引邵本良的注意力，在柳河与三源浦之间的黑山咀打埋伏，歼灭了邵本良老七团二百多人，日本鬼子刚发给的一门小钢炮、几挺机关枪全都装备了抗日联军。十月份在寒葱岭截击了邵本良副官押送的四十辆火车棉衣，歼灭了押车的一中队伪兵，连邵本良的小老婆也当了俘虏。一九三六年春天，邵本良从沈阳开完“讨伐”会议回来，组织全部兵力要围歼杨靖宇的抗联一军。日军派给邵本良一个迫击炮连，又出动飞机配合行动，还调动许多股伪军归他指挥，这还不够，日伪妄图全部吃掉一军军部、一师、二师、三师，不惜下大赌注，把山海关的日军第十师团、奉天野炮营都调来了。邵本良向日本司令夸下海口，要在三个月内全部肃清东边道的抗日联军。杨靖宇同志面对装备精良、气焰嚣张的敌人，灵活运用游击战术原则，采取“走”和“拖”的方针，忽南忽北，忽东忽西，把邵本良拖得疲惫不堪。这汉奸求功心切，穷追不放，摆出决战的架势，要和抗联决一胜负。杨靖宇率部队避免与敌主力接触，并制造种种假象迷惑麻痹敌人，日夜兼程，走了一个月零三天，行程数千里，用佯攻战术突破老秃顶子的包围。六月下旬在本溪以东赛马集山区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战斗先后进行不到四小时，全歼敌人一千多，日本顾问英俊志雄吓得躺在死尸堆里，脸抹血污装死。邵本良受重伤逃回沈阳。养好伤，日本人送他七挺机关枪，叫他赎罪立功。邵本良收拾残兵败将，妄图垂死挣扎。在四道江又与抗联一军遭遇，日本顾问英俊志雄终于被打死，邵本良成了漏网之

鱼，以后在临江蚂蚁河被杨靖宇队伍包围，这个做恶多端的走狗汉奸终于被击毙，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一九三八年以后，在抗日条件日趋艰苦恶化的情况下，杨靖宇和他的部队经历的战斗更为频繁了，但还打了好几次很漂亮的伏击歼战，特别是袭击老岭隧道，敌人损失巨大，使日本侵略者掠夺东北矿藏的计划受到严重阻碍，日伪当局急忙从热河调动所谓拥有“皇军剿匪之花”称号的“索旅”前来集安讨伐杨靖宇。杨靖宇在文字沟设埋伏圈，全歼索旅一个团。索旅长十分恼火，带领剩下的两个团找杨靖宇决战。杨靖宇乘敌不备，在长岗、庙岭突袭敌人，缴获了七挺机枪，一百多枝步枪和许多军需品，全歼索旅两个团。索旅长带着十来个卫兵，哭着逃走了。

一九三八年秋天，敌人调集了伪军十一个军管区和三个日本关东军支队的力量，经过半个月的筹划，调集八千重兵，设下八道防线，在临江里外岔沟至八道江一带，布置了他们自诩为插翅难飞的“铜墙铁壁”。杨靖宇只率领一个警卫旅的少数兵力，不到一昼夜的功夫，消灭日伪军两个团，杀开八道帐篷网，冲破了这个“铜墙铁壁阵”，从通化地区向边境集安、临江、长白做战略上的转移。这时，杨靖宇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在长白山区，运用他根据东北特点创造出来的“半路伏击”“化装袭击”“远途偷袭”等游击战术，跟敌人进行麻雀战。

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〇年初，杨靖宇以濛江县城为中心出没于辉南、抚松、临江等地，积极扰乱敌人，攻打孤立的据点，夺取粮食和衣物，以粉碎敌人的冬季“大讨伐”。而敌人这次“大讨伐”，是关东军既定的要消灭瓦解一路军的东南部“治安肃正”计划，在吉林、通化、延边及牡丹江南岸进行规模空前的大扫荡。同时悬赏二万元捉拿杨靖宇，到处散发传单，并在群众中大肆散布谣言说：“满洲国允许东边道独立了，东边道要归杨靖宇管辖了，”

甚至指名道姓地说：“杨靖宇若能归顺，封你为东边道都督……”靖宇同志笑着说：“鬼子真是黔驴技穷了”。就在这前后，原抗联一军第一师师长程斌，可耻地叛变了革命，并做了讨伐队长。这个民族败类不仅了解抗联的战略战术，也知道一军在长白山区的兵力部署与后勤基地。这时一路军警卫旅参谋丁守龙也被捕叛变，敌人从他口中得知杨靖宇的行动部署。一九四〇年二月五、六日，杨靖宇率部二百余人来辉南马屁股山，准备按预先约定与政治部主任伊俊山接头，不料与敌遭遇。在失利的情况下，特务排长张秀峰投降了“讨伐队”，敌人根据张秀峰提供的情报，了解了杨靖宇的行踪，把攻击的目标集中在杨靖宇身上。通化警务厅长岸谷龙一郎亲自指挥，采用“壁虱”战法，紧紧咬住杨靖宇不放，轮番追赶。杨靖宇及其部队被层层包围在濛江西排子的大清沟里，转过来是敌人，转过去还是敌人。最后杨靖宇用分散突围的办法，组织冲出了部分队伍。他身边只留下十四、五个人了，敌人仍紧盯住不放，情况万分危急。杨靖宇同志这时正患感冒，一连几天没有吃什么东西，但仍然坚持着用双枪向敌人开火，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队伍只剩下七个人。他毫不沮丧，反倒满怀信心地说：“敌人是捉不到我们的。就是我们几个人死了，还有人继承我们的事业。革命总是要成功的。”最后，他只带着两个警卫人员继续在敌人包围中设法联络部队。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五日，又与追击的敌人发生一次激战，他设法摆脱了敌人，冲了出去，还“利用了地形，不断地开枪射击”^①他用手枪打死敌人一名，打伤六名。二月十八日，两名警卫员牺牲了，只剩下靖宇同志一人。二月二十二日之夜，他就在濛江西南保安村前一个地枪子^②里度过，由于气候在零下四十度，靖宇同志衣着单薄，一连十

① 见伪满《协和》杂志第263号。

② 地枪子，就地挖的土坑。

来天没吃饭了，地垡子四面透风，他的脸颊和鼻子都冻破了。二十三日上午，杨靖宇在山上被敌人发现，敌人急忙集合队伍，迅速包围了保安村，从四面八方跟踪追击杨靖宇。靖宇同志边走边打，最后靠在一棵大树旁，扒开雪，把下半个身子埋住，继续向敌人猛烈射击，敌人越逼越近，“再一次向他劝降，但代替他的回答是手枪的子弹”^①敌人眼看不能捉活的了，就向杨靖宇猛烈射击，短兵相接、打了二、三十分钟，突然，日本侵略者的几颗罪恶的子弹射中了杨靖宇同志，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就这样壮烈的牺牲了。敌人把他的遗体运回濛江县城，经解剖发现“胃里连粒饭都没有”^②，在场的中国医生感动得暗自垂泪。

敌人把杨靖宇的遗首割下来，拍成照片，印成传单，到处张贴，并在城里大开“庆祝会”，报纸上也用特大号的黑字印着“射杀怨敌杨靖宇”、“杨靖宇部已被肃清”，同时还宣布所有参加“讨伐”杨靖宇部队的放假三个月。可是，据敌伪《匪袭调查》所载，杨靖宇同志牺牲后一个月即有如下战斗：三月二日临江珍珠门、太阳岔一带的警防队，森林队受袭击；五日临江三岔子东南满军六团和森林警察队被围；六日在濛江湾沟长岛工作队遭受痛击，伤亡十一名，轻机枪，步枪被缴；三月中旬发现曹亚范的主力不断出现在濛江湾沟，临江大板石沟等地，进行盘旅游击。从三月二十二日直到月末，一军所辖队伍频频出现于临江、濛江、辉南，柳河、抚松等地。血的事实使敌人不得不承认，杨靖宇人虽不在了，精神却在，抗联一路军仍然在坚持战斗。

这时候，在群众中流传起各种各样的传说，有的说杨司令在被日伪军警包围时，突然飞来一匹大红马，驮起他就跑，冲出了敌

① 伪满《协和》杂志263号。

② 伪满《协和》杂志263号。

阵；有的说，杨靖宇将军负伤后，被一个老汉背到地窖里，喝了人参汤，很快就养好了伤……总之，人民群众不相信杨靖宇会死，一首在长白山区广泛流行的歌谣反映了群众这种心理：

“十冬腊月天，松柏枝叶鲜，
英雄杨靖宇，长活在人间。”

杨靖宇同志虽然牺牲了，但他那崇高的革命精神彪炳千秋，成为鼓舞人民斗争的巨大力量。人们高呼着杨靖宇的光辉名字，唱着他写下的气壮山河的战歌，一直坚持到“九·三”胜利。

2 抗日英雄罗登贤、魏拯民、 赵尚志、李兆麟、陈翰章、周保中、冯仲云

罗登贤同志原籍广东顺德人，一九〇三年生，海员出身。他一九二五年入党，是大革命时期著名的省港大罢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之一。党的六大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后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罗登贤（1903—1933）

“九·一八”事变当时，罗登贤同志正在东北，他化名达平，是中共中央驻东北的代表，并兼任满洲省委书记、组织部长，是我党当时在东北的主要负责人。“九·一八”事变后几天，登贤同志在

哈尔滨道外召集了北满中共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会上明确提出了“敌人在东北，而东北人民都还在东北，因此共产党员也必须在东北”^①的号召，罗登贤同志的这个主张，坚定了东北共产党人为解放东北艰苦奋斗的决心，他们与人民在一起，拿起武器，挺起胸膛，走上了民族革命的战场。

一九三二年初，登贤同志带着中共中央出版的《红旗报》，从沈阳回到哈尔滨，组织党内学习。这份报上发表了周恩来同志的文章，提出在东北必须发动民族革命战争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把敌人赶出东北。据此，罗登贤同志又进一步提出共产党员要下乡组织群众，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号召。他亲自和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杨佐青同志谈了一夜，让杨佐青同志到当时抗日斗争比较活跃的磐石去搞武装。他非常激动地说：“我们坚信，东三省不会被灭亡。劳苦大众的反日斗争，正在各地风起云涌地开展起来。在这个时候，我们党的责任，就是把这些自发的斗争，变成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同时要建立党领导的工农义勇军。”^②他还派冯仲云同志去汤源组织抗日游击队，详细而又具体地交待了去下江后的工作任务和方法。这样，在登贤同志的领导下，党先后创立了磐石、海龙、汤源以及吉、辽一带其它反日游击队和延吉、和龙、琿春、汪清等游击队，后来发展成抗联各军。同时，他还通过各级党组织动员爱国的工人、知识分子积极参加当时马占山、李杜等人的抗日部队，组织抗日统一战线。

登贤同志十分注意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特别是在哈尔滨、旅顺、大连、沈阳等这些日伪统治的中心，积极发动工人进行抗日活动，从消极抵抗的罢工，提高到政治示威和武装斗争上

^① 《中国共产党烈士传》第245页，青年出版社，1951年版。

^② 见《星火燎原》第4辑第379页。

来。他直接领导了奉天兵工厂工人、抚顺煤矿工人及全东北一些大的企业工人的英勇反日斗争。总之，在登贤同志的领导下，东北抗日斗争开始出现一个新局面。这引起敌人的恐惧和憎恨，逮捕名单上把他列为第一名，在沈阳几次遇险。于是中共中央调他回上海工作。

他到上海后，立即参加了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工作，担任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很快就组织了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的反日大罢工，继续从事抗日斗争。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八日，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在会审公堂受审时，他昂然挺立于敌人法庭上，慷慨陈词地斥责敌人说：“你们说我的罪名是‘反动分子’。我要告诉你们我的经历。我在一九二五年帮助组织与领导了省港罢工。我现在刚从东北回来，在那边我同义勇军一道作战，打击日本强盗。我曾在日本纱厂帮助组织罢工。那些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难道这就是我被控告为从事‘反革命活动’的理由吗？”^①敌人被问得哑口无言。当时，宋庆龄为营救罗登贤同志，公开发表宣言，指控国民党。残暴的敌人最后还是对他下了毒手，登贤同志至死不屈，他坚决表示：“什么也不能动摇我，我将我的生命献给我们的党与全中国的无产阶级。”这位东北人民十分怀念的忠勇的抗日战士，终于在一九三三年八月被枪杀于南京雨花台。

魏拯民同志原名关有维，又名魏明生，一九〇九年生于山西省屯留县王村。大革命时期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一九二六年入团，一九二七年转党。一九二七年国民党蒋介石血腥镇压共产党人，太原党组织遭到破坏，魏拯民逃出太原，来到北平，一面读书，一面搞学生运动。

一九三二年春天，他被党派往东北，在哈尔滨进行抗日活动，

^① 宋庆龄：《告全国人民——号召大家一致起来保护被捕的革命者》（1933年4月1日）。



魏拯民（1909—1941）

任中共哈尔滨市区委书记。

一九三四年冬，童长荣同志牺牲后，他被派往东满，接替童长荣同志的工作，任东满特委书记并兼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政治委员。魏拯民同志一到东满，便深入到各县委与游击队中去，和干部、战士们在一起促膝谈心，了解情况。当时东满游击队的干部只注意游击队的工作，不抓地方上的群众工作和对山林队、义勇军的统战工作。在肃清“民生团”叛变分子斗争中，有“左”

倾错误，影响了部分干部与战士的积极性，情绪不高。魏拯民同志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于一九三四年底，代表省委在湾湾沟召开了东满特委扩大会议。他总结了东满工作经验，肯定了成绩，并且批判纠正了“左”倾错误及其影响。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干部训练班，由魏拯民亲自授课，集中训练一批做地方工作和统战工作的干部。

一九三五年初夏，他参加党中央代表团，出席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同年冬回国后，率领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南征到长白山区，在通化县回头沟与杨靖宇同志第一次会晤，组织了东南满临时省委，继任东满特委书记、东南满临时省委青年部长。魏拯民同志把一本从莫斯科带回来的《共产党宣言》送给了杨靖宇同志，杨靖宇同志把刚缴获的崭新的小枪

子手枪送给了魏拯民同志。自此，他们在战火中建立起了战斗的情谊。

魏拯民同志为革命事业而辛劳成疾，他患有严重的胃病和心脏病。一九三七年和三八年期间，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在杨靖宇同志的再三劝告下，才住到密营中去休养。但他并不休息，仍然在密营内指挥部队作战和写抗日救国文章。他经常对战士们讲：

“革命不能光靠勇敢和热情，还要有政治头脑，要有远大理想。政治是武器，它不但能使我们进步，更能有力地打击敌人。……咱们向老乡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发动群众起来打日本鬼子，这就是政治工作。咱们抗联的每一个指战员都要是个政治宣传员”。^①他带头做思想政治宣传工作，象唠家常一样，给战士们讲革命道理，启发战士的阶级和民族的觉悟。为了让全军战士学习政治，同时学好文化，他不管心脏病多么严重，还亲自动手编课本。

魏拯民同志也是一个打游击的能手。化整为零，打伏击，集中兵力、攻据点，成了他的拿手好戏。激战大清沟，奇袭大沙河，伏击松岛讨伐队，拔掉庙岭据点等都是载入抗联一路军战史中的著名战例。他率领部队活跃在长白山麓，几次和杨靖宇会师。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一日在辑安老爷岭召开东南满临时省委党代表和一、二军干部会议，正式成立抗联第一路军，杨靖宇同志任总指挥兼政治委员，魏拯民同志任付总指挥兼政治部主任。

一九四〇年二月，杨靖宇同志壮烈牺牲的消息传来，魏拯民同志悲痛欲绝，他立刻离开密营到部队去，在松林里举行追悼大会，并带领一路军指战员庄严宣誓：“为了祖国人民，为了杨总指挥，我们第一路军全体战士，紧密团结，坚决继承烈士的事业，

^① 东北烈士纪念馆编：《抗日英雄魏拯民》第28页。

踏着烈士的血迹，继续奋战，克服一切困难，把鬼子赶出鸭绿江。”^①他抱病带领队伍向东转移。一九四〇年秋末，魏拯民病情加重，经常发昏晕倒地上，他却十分乐观的表示：“病怕什么？不怕肉体病，就怕思想病。”一九四一年三月八日，魏拯民同志终因病重和饥饿，病死于桦甸县的牡丹岭西麓二道河子密营中。临终前，他还坚信革命必然成功，抗日一定能胜利，他说：“……革命是艰苦的，要打倒敌人，就要流血牺牲，可是，我们的血不会白流，我们的革命红旗，会插遍全中国。”^②

赵尚志同志在东北抗联中是战功卓著、夏伯阳式的英雄。他一九〇八年生于热河省朝阳县六家子（今辽宁省朝阳地区）一个中农家庭里。小时念过三年私塾，到哈尔滨当过杂役、学徒，一九二四年入哈市许公中学读书，在校时经彭守朴介绍于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五·卅”惨案发生后，因他领导同学声援上海工人斗争，而被学校开除。同年冬，离哈去广东黄埔军校。一九二六年中山舰事件后离开黄埔返回东北。先后在双城、长春、哈尔滨等地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七年三月被捕，一九二九年出狱。一九三〇年四月在沈阳国民外交学会进行革命宣传演讲时，又被捕入狱。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在党营救下与杨靖宇同志一道出狱，先后担任满洲反日总会党团书记、省委常委，负责军委工作。一九三二年六月，满洲省委为加强对张甲洲部队的领导，派赵尚志同志做省委代表到巴彦张甲洲部工作，在张部当参谋长，化名李先生。同年冬，张部失败。为了抗日，赵又打入哈东一带抗日义勇军孙朝阳部队，不久，又任该部参谋长。这时与中共珠河县委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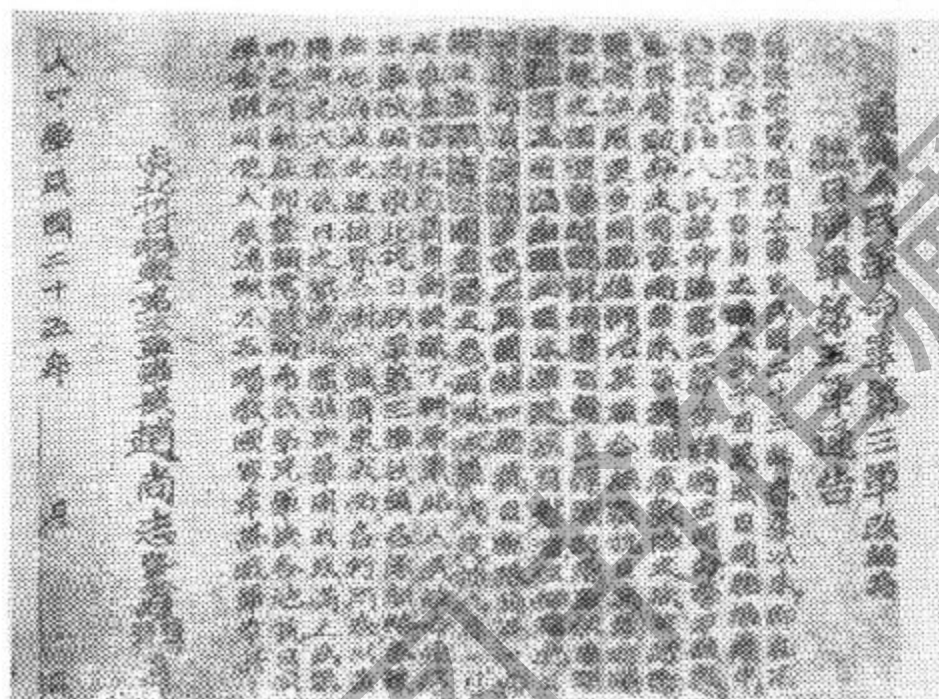
^① 见东北烈士纪念馆编《抗日英雄魏拯民》第51页。

^② 同上第55页。

到孙部进行抗日武装工作的李启东同志接上关系，此后他们便互相配合，共同工作。但由于孙朝阳被日军玩弄的反间计所愚，对赵尚志产生怀疑，置其正确意见于不顾，为日本特务机关所骗去哈遇害，其部也瓦解了。赵尚志险些被害，他带领七名党团员退出。一九三三年十月，在珠河县委领导下，以他们七人为基础，另补充了六名队员，只凭两枝手枪，成立了珠河反日游击队，赵尚志被选为队长。他率队活跃在珠河铁道南北，相继缴了东西五甲、张家湾、板子房等地警察局所，很快使游击队掌握了四十枝枪，队员发展为五十人。

一九三四年春天，在赵尚志主持下于铁北召集了有二十多名反日义勇军、山林队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会上成立了哈东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选赵尚志同志为总司令。自此，珠河游击队的声名远震滨江、延寿、珠河、方正等地。敌人见此情势，就改变策略，暗中收买山林队的于九江，让他破坏哈东一带的反日统一战线，继之，又提出“专打赵尚志不打义勇军”的口号，企图孤立珠河游击队。同时，敌人又在哈尔滨逮捕了赵尚志同志的父亲，伪造文件，派人送到游击队，规劝投降。赵尚志虽为年迈的父亲担心，但并没有动摇他抗日救国的决心。一九三四年夏，珠河游击队扩大为四百人，改编成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任支队司令。是年中秋节，支队一举攻克了哈东重镇五常堡，敌人大惊。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赵率队在方正肖田地与敌遭遇，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赵沉着指挥部队英勇奋战。虽左腕负伤，仍奋臂洒血苦战。且打且退，部队秩序井然，连敌人都为之惊叹。这场苦战，消灭日伪百余名，胜利地突了围。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八日，满洲省委决定将哈东支队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赵任军长。不久，赵率部分主力沿牡丹江岸东征，开辟依兰、延寿、方正新区。三月间，三军与较大的



以赵尚志（1908——1942）名义发布的抗联通告

抗日义勇军联合，成立了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赵尚志被推举为总指挥。赵尚志、李延禄联合其它部队约四百余人，攻打下方正县城，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气焰，鼓舞了士气，提高了三军的威信。赵于九月间率队回师珠河，十一月间，他按珠河县委决定，向勃利、依兰、通河、汤源一带远征。赵尚志同志到汤旺河地区后，在汤源召开东北反日联合军军政联席扩大会议，会上根据“八一”宣言精神，宣布由人民革命军第三、第四军，汤源游击总队，谢文东的民众军，李华堂的支队组成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赵尚志被推举为总司令。这时赵所领导的部队，突破了通汤大界，在松花江下游壮大了抗日武装斗争的声威，并在汤源建立了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开办了后方医院、修械所、政治军事学校以及电讯学校等机构。

一九三六年春天，赵率三军司令部、少年连等队伍向西征讨，开始在苏拉河街缴了敌伪军局所的械，然后向通河、木兰、巴彦进发，一路上东征西战，不断打击敌人，缴获了许多武器弹药。一九三六年秋天，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改为抗联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同年冬，他率三军五百余人的骑兵和六军一部分队伍，向海伦、德都、通北一带远征。在海伦附近，赵尚志亲自指挥了北满最著名的冰陞子战斗，打死日伪军七百余名，其中有七名日本指挥官。战斗结束之后，赵将三军五、六师留下二百余人，开辟海伦、铁力一带新区。他率领司令部直属队伍继续北上龙门等地进行远征。经过大小百余战，打死打伤敌人八百余名，俘虏三百余人，攻城不下二十三个，缴获许多武器弹药。敌人害怕三军突入嫩江平原，又匆忙调集大批兵力在北黑、呼海铁路沿线的绥化、庆安、海伦、龙门等地到处截堵。在赵尚志亲自率领下，部队以能打、能冲、能拼的过硬作风和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凌厉攻势，分头突击，主动调动敌人，转战于萝北、佛山、汤源、海伦及黑河流域地区，使活动在松花江南岸的三军四师和抗联各军减轻了压力，并为开辟海伦、嫩江平原的游击战争创造了条件。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赵尚志“在北满一带展开狰狞的勇猛果敢的游击活动”^①。

后来，东北抗日斗争进入十分艰苦的阶段，赵尚志仍在不停息地进行战斗，他率领总司令部约百余名精兵，活动在萝北、汤源一带国境线上，破坏日本重要交通线和军用仓库等，以箝制日本的兵力。

一九四〇年二月，赵尚志被调往抗联第二路军任付总指挥。

日伪慑于赵尚志军事上的威力，不搞正面“讨伐”，而采用特

^① 摘自敌伪档案第206卷。

别工作班搞谋杀，派出一些特务打入赵尚志部队内搞破坏暗杀活动。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二日，赵尚志率领小部队袭击鹤立县梧桐河警察分所时，途中被鹤立县兴山警察署长田井久次郎派的特务刘德山从背后枪击负了重伤，被梧桐警备队俘获。敌人审问时，赵尚志面无惧色，大骂日伪军，用眼睛狠狠地瞪着敌人，对重伤引起的痛苦不吭一声。对他这种誓死不屈的英雄气概，连敌人也不得不惊叹地说：“真不愧为一大匪首的本色。”^①八个小时之后，赵尚志同志壮烈牺牲，年仅三十四岁。

李兆麟同志，就是有名的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的总指挥张寿箴。他于一九〇八年生于辽宁省辽阳县。小时因家境贫寒，放过猪、牛，当过“半拉子”。^②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在北大加入共青团，一九三一年成为共产党员，他根据党的要求，一边读书，一边在西郊门头沟做工运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他立即加入了北平的抗日救国会，不久被派到辽西抗日义勇军耿继周的部队里，在新民一带进行过多次英勇战斗。耿部失败后，他又被派到辽西李春润部抗日义勇军去。不久，李部又遭到失败，他便到了沈阳，党派他去本溪湖煤矿发动工人抗日，组织起三百余人的救国会。一九三三年在沈阳养病，兼做城内伪治安军的瓦解、策反工作。一九三三年秋到哈尔滨，在满洲省委军委工作，后去北满，以巡视员身份到珠河，与赵尚志、李启东等同志创立珠河游击队，任付队长。后来队伍发展扩大，成立哈东支队，李任政委。不久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李任一、二团政治部主任兼军部宣传科长。

一九三六年一月，北满地区成立东北抗联总司令部，李兆麟同

^① 敌伪档案第206卷。

^② “半拉子”，东北土语，即半劳动力。

志任总部政治部主任，兼任六军政治部主任。一九三六年春天，日军收买当地猎手于四炮，封为山林警察队大队长，利用他为日军采集木材，切断抗联与群众的联系。这条走狗十分横虐疯狂，抗联决定拔掉这颗“钉子”。李兆麟同志奉命率一支五十余人的精锐的轻骑兵，进行远距离的奇袭，机智勇敢地全歼了敌人。从此汤旺河两岸广大地区成为抗联比较巩固的根据地。

一九三六年夏，抗联在汤旺河、沙冲河畔建立军事干部学校，由李兆麟同志任教育长，为抗联培训了许多军政干部。一九三八年初，他率领六军军部教导队和十一军一部分共七百人，活动于松花江下游萝北、鹤立、绥滨一带。他指挥六军攻打萝北县北兴镇，使敌人大为震惊。

一九三八年春，日本侵略者妄想将抗联围圈起来，压向国境线，聚而歼之。为粉碎敌人计划，各路军必须跳出包围圈，分路西征。三路军经过整顿后，开始分批向海伦西征，挺进嫩江平原。同年十一月，李兆麟同志率领最后一批队伍，沿小兴安岭山林向海伦挺进。时值隆冬季节，寒风凛烈，大雪纷飞，战士缺衣少粮，在群众的支援下，用棉被当成棉衣，忍着冻饿，越过崇山峻岭，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成立，赵尚志没到职，李任总指挥。从此，兆麟同志领导三军、六军、七军、十一军在海伦、克山、德都、肇源、肇东地区开展平原游击战，先后建立了讷河县委、肇州工委以及绥化、景星等地的地下党和群众抗日组织，积极从事抗日活动。一九四〇年春秋之间，讷莫尔河水多次泛滥，无法渡河，沿山又驻扎日本武装开拓团，李兆麟身边所留兵力不多，一时冲不破敌人封锁线，被困在河边，连续几十天，他没有吃过粮食，仍然非常坚强地给大家讲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不降周的故事，鼓励同志们矢志忠贞于祖国，决不忍辱投敌。

一九四〇年前后，三路军龙北部队与敌人进行四十余次战斗，打了三十多个胜仗，共缴枪五百余支，消灭与俘敌七百多名，并先后攻克讷河、克山、肇源等县城，箝制敌人不能入关。连敌人也不能不感受到李兆麟同志及其率领的第三路军是个巨大威胁。

就这样，李兆麟同志和第三路军的抗联战士们，一直坚持到“九·三”胜利，改为人民自卫军加入东北民主联军，兆麟同志在群众的拥戴下，担任松江省副主席。一九四六年三月九日被国民党特务骗到哈尔滨市水道街九号，遭暗杀。

陈翰章同志一九一三年生在吉林省敦化县半截河屯一个农民的家庭里。“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利用敦化县民众教育馆举办讲演会，鼓动群众的爱国激情。一九三二年九月他加入了抗日救国军。救国军当时的成份比较复杂，负主要责任的吴义成、孔宪荣等人系旧军队出身，对抗日动摇、观望。但是参谋长周保中等共产党员抗战最坚决，在部队中也最有威信。一九三二年十月初，在第一次攻打宁安城时，陈翰章受到很大锻炼，表现出他具有军事指挥员的才能，同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五年春，抗联五军成立，陈翰章同志任五军第二师参谋长兼师党委书记。敌人逮捕了陈翰章的父母和妻子，并胁迫敦化士绅连坐，硬逼陈翰章的父亲和妻子前来劝降。翰章向父亲宣传了抗日救国大义，为免去连累亲人，声明从此和家庭断绝关系，送走了父亲、妻子。日军玩弄“亲人劝降”的诡计宣告失败，但仍不死心，继续派出各色人物展开政治攻势，其中有日本政治浪人雄谷，敦化县警务科的密探等等，都没有成功。不管是硬的，还是软的，都动摇不了陈翰章抗日的决心。

一九三六年春，翰章调任抗联二军第二师任参谋长，并代理师长职务，开辟了以宁安南湖头为中心的穆稜、额穆、敦化、东

宁、汪清等游击区，一九三六年九月，他率领部队在牡丹江东北太平沟夜截日军军用列车，全歼了阔边司令亲自带领的讨伐队十九师团三、四百人，缴获大批军火给养，使日军十分震惊，称之为“第一次事变”。

一九三八年部队改编，五月，陈翰章同志任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带领十三、十四、十五三个团，先后打了好几个漂亮的伏击战。如分兵合击猛打大沙河，缴获百余枝步枪、二十多箱子弹，还有小炮、轻机枪等；寒葱岭伏击战打死了松岛部队长等二百七十人，缴八、九十枝步枪、七十多箱子弹，还有轻重机枪与小炮和给养军衣等；借西风火烧额穆北小青顶子芦苇塘，日军被刺死三十多个，活捉了四十多个警察，其余被烧得焦头烂额，抱头鼠窜。

陈翰章在紧张的战斗中，还十分注意检查与整顿队伍的思想作风，特别是利用队伍集中休整的机会，学文化，搞文娱活动，定期开思想检讨会，有时针对大家认识模糊的问题召开战地讨论会，启发引导，提高战士们的政治觉悟。他常对战士们讲：“……我们每个革命战士都应该牢记自己的责任，我们是为了解放所有受苦的穷人而活着而战斗的！”^①在陈翰章的鼓动宣传下，战士们的阶级觉悟与民族意识日益高涨，他们为了给杨靖宇司令报仇，在牛心顶曾迎战日伪军二千余人的联合进攻，最后用机枪和刺刀杀开一条血路，冲出敌人的铁壁重围。

一九四〇年秋天，敌人集中大批兵力，准备对抗联游击队进行大规模围攻，妄图利用秋冬季节，一举消灭吉东一带的抗日联军，情况很严重。陈翰章却毫不畏惧，将队伍化整为零，他率领一部分人，仍留在镜泊湖一带继续与敌人苦斗。一九四〇年十二

^① 东北烈士纪念馆编《抗日英雄陈翰章》第59页。

月八日，他和三十几名战士，在暴风雪中和敌人周旋于镜泊湖的南、北湖头，因叛徒出卖，被重重包围于南湖头的小湾湾沟，血战半日，弹尽力竭，他仍然顽强地坚持着。机枪手牺牲了，他拉过机枪扫射，子弹打光了，他用匣枪。敌人喊着：“投降！投降！”得到的是怒骂和枪声。……敌人的一排枪扫倒了陈翰章同志，他的右手被打断了，匣枪甩出老远，他又咬着牙用左手抽出袄里的小手枪，狠命的打了几下，敌人又倒下几个。最后，他英勇地牺牲在战场上，年仅二十八岁。

周保中，一九〇二年出生于云南大理弯桥村一个鞋匠的家里，原名奚李元，白族人。他在云南讲武堂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一九二六年后任北伐军团长、副师长。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四·一二”叛变革命后，旋即离开，到中共中央军委工作。一九二九年去苏联学习军事，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时回国。

一九三二年初，党派他到东北。此时杨靖宇同志已去磐石游击队，他接杨靖宇的职，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随着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为了深入发动群众，更快地搞起武装，党派周保中同志从珠河到依兰又到宁安一带组织赤卫队、抗日救国会，同时也让他寻找机会打进东北军余部做兵运工作。一九三二年五月，他在宁安东一个老百姓家里，被吴义成的救国军当作“日本探子”抓去，一路上，他不断地对士兵们进行抗日宣传，进一步激发了官兵们的爱国热情，不仅没有杀他，反倒把他留在救国军宣传部内工作。后来，周保中同志又转到李杜部队去活动。为了统一东北军余部几个部队的指挥，救国军、自卫军组成了联合司令部，他们聘请周保中同志去做参谋总长，指挥领导了吉东、宁安、敦化一带的抗日斗争，在联合司令部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当时，救国军与自卫军的将领相互闹不团结，两军关系最后绝裂，日本侵略者乘机



周保中（1902—1964）

的，他就主动将自己的脱下来，给战士们穿。夜晚在林间宿营时，他总要查查铺，看看战士们是否睡得好，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他不让战士们称他军长，而战士们又深深感受他的阶级友爱有如慈母般温暖，因此大家都叫他“老母亲”。

大举进攻，李杜、王德林带领一部分部队离开东北撤往关内去了。周保中同志和胡泽民、王毓民等同志一起重整残部，并争取了宁安东南最大的山林队“平南洋”

（李荆朴）、南北湖头的“名利”（王汝起）、宁安南的“占中华”（傅显明）和东京城的王毓峰、额穆的于学堂、救国军柴世荣等，汇成六路，组织了吉东抗日同盟军。在此基础上，于一九三五年建立了抗联第五军，周保中同志任军长。

在周保中同志的带领下，五军军纪严明，注意做群众工作，深受老百姓的欢迎。因此，在牡丹江刁岭一带，建立了很有群众基础的抗日游击区。

周保中同志十分爱护战士，看见战士们有缺衣少袜

一九三七年一月，在依兰县牡丹江四道河子召开的吉东省委会上决定，以抗联四军、五军、七军、八军、十军等编成抗联第二路军，周保中同志担任二路军总指挥，同时任吉东省委书记。

当时，日军熊谷联队八百余人和伪兵第二十九团后勤御林军一千余人，自冬季讨伐后，一直龟缩在依兰城，进行整休。二路军为争取主动，决定先发制人，攻打依兰城。方针是诱敌出城，半路伏击。战斗只打了五、六个小时，就使敌伪死伤约五百余人，大挫了他们的侵略气焰，打开了下江的局面。受此战役影响，伪军第二十九团后勤御林军由伪少将团长贺奎伍带领全团于三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在依兰暴动，哗变反正，投到抗联这方面来。

为了推动抗日高潮，恢复久已被日伪割断的吉东、北满与南满的联系，周保中决定将其领导下的二军五团改编为第二军独立旅，赴南满远征。周亲自给战士们做动员，讲明远征的意义，并对部队进行整编装备，由伊俊山等同志带领，于四月初从依兰、方正间大小勒勒密三道通出发，历尽千辛万苦，于第二年五月初，带着五军和二军指战员们的战斗情谊，在辑安老爷岭与杨靖宇同志的部队会合。

一九三八年，东北抗日斗争开始进入艰苦阶段，敌人妄图把南满、北满、吉东等三路抗联部队压缩在三江一带的包围圈中。按统一部署，为冲出包围圈，五军组织西征，翻到老爷岭西。在向五常、榆树、舒兰移动时，又陷敌围。一九三八年初，一师师长关书范在敌人压力下开始动摇，主张要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不惜承认条件，与敌人谈判。遭到反对后，又亲去佳木斯从事叛降活动。周保中同志得知此情况后，当机立断，立即召开吉东省委扩大会议，决议宣布关是民族叛徒，在哪抓到，就地枪决，并开除党籍。等关从佳木斯回来后，一切按决议行事，惩处了叛徒，大振了部队士气，使敌人妄图瓦解五军的计划破了产。但是，

由于叛徒出卖，总指挥部暴露了，部队行动部署也被敌人掌握。面对这重重困难，保中同志坚定、沉着地指挥部队，利用敌人的缝隙进行活动，抓住有利时机，突袭陈家亮子，给敌人以出其不意的打击，之后转入牡丹江西夹沟密营。就在敌人讨伐指挥部附近与敌周旋四十五天。

一九四〇年以后，在抗联不断遭受挫败的形势下，保中同志为保存组织、积蓄力量而创建野营，集中已经疏散的队伍，对部队进行整顿训练。面对敌强我弱的困难局面，抗联内部产生了一种取消主义论调，认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前途到此为止，把东北党和游击运动取消，抗联可不保存组织……。以周保中同志为代表的一些同志，明确表示反对这种错误主张，保中同志认为，民族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斗争还是有前途的，要坚持斗争到底。并提出根据形势的发展，组织要统一，部队要化整为零，改编为支队，坚持活动，内部思想纪律要统一。

一九四一年后组织开始调整、统一，一九四二年组成了东北党委员会，周保中同志是负责人之一。这时本着团结斗争的精神，将抗联编为十个支队，由东北党委会直接领导，继续坚持斗争，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配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在胜利的凯歌声中会师八路军。

冯仲云同志，江苏武进人，一九〇八年生。在抗联领导干部中是为数极少的知识分子出身干部。一九二七年四月，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三〇年四月，在北京青年会搞飞行集会时被捕，十月被释放后，由老师介绍来哈尔滨商船专门学校教书，以此为掩护，积极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冯仲云同志以教授身份团结了一批爱国的进步文化人，如肖军、肖红等进行各种集会活动，撰文著书，大造反日舆论，启发民众的抗日觉悟。

一九三二年一月，满洲省委由沈阳迁到哈尔滨，冯仲云同志的家一度成为省委常委机关和秘书处所在地，罗登贤同志在那里办过公。由于突然发生日本侵占事件，许多中心县委如汤原、汪清、虎林等均与满洲省委失去联系，党的全面工作推不开，活动经费也不足。仲云同志以省委外部交通的身份，积极进行党组织的恢复联络工作。

一九三二年秋，仲云同志被省委派往汤原，在松花江下游一带检查、巡视工作。他根据当地反日同盟会组织活动的发展状况，对汤源中心县委工作做了进一步的指导，特别强调了建立抗日武装的必要，并积极参与组建汤源游击队。同时，仲云同志又在鹤立岗煤矿活动，拉起了一支约有二十人左右的煤矿工人游击队，还在下江一带群众中发展了党的组织和抗日群众组织，加强了该地区的地方工作。

一九三三年四月下旬，仲云同志一度作为南满巡视员，去磐石中心县委和红军及海龙县委与游击队传达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对这些地区执行党的统战政策，掀起联合抗日高潮，有很大推动。当时，满洲省委和磐石县委失去联络已经几个月了，没有接头关系，进游击区十分困难。他先到吉林找关系时，正赶上叛徒金景出卖组织，吉林特支被日伪破坏殆尽，由于仲云同志机敏警惕，安然地逃出虎口。他在群众的帮助下，躲过了日本走狗东边道地头蛇邵本良讨伐队，终于和海龙县委取上了联系，随海龙游击队边活动，边传达，使党的指示深入人心。接着仲云同志又动身去磐石，在一没有认识人当向导、二没有固定联络点，既带浓厚的南方口音，又不懂东北农村风俗习惯的条件下，仲云同志机智地冲过伪兵的几道卡哨，终于到达了磐石中心县委所在地——生财沟子，向县委及李红光和红军三十二军指战员传达了中央的指示。

从南满回来后，冯仲云同志继续在满洲省委工作，任秘书长。一九三四年秋天，仲云同志离开省委去珠河游击队。一九三五年一月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后改抗联第三军），冯仲云同志任三军政治部主任。此后，相继担任过北满省委书记、六军政治部主任、第三路军政委，在东北坚持了长期的游击战争。

在抗联斗争最艰苦的时期，一九四〇年八月，冯仲云同志与王明贵、高禹民等同志指挥三支队与九支队深入敌后，打响了有名的克山战役。当时克山守敌兵力雄厚，西门外驻有日本守备队和伪军两个大营，城里驻有伪军一个团和警察署、警务局等武装，而冯仲云、王明贵、高禹民等为了以少胜多，却做了城内主攻、城外阻击的军事部署，用一个加强班的兵力，牵制西门外的两个大营，主力则选城西北角为突破口，两下一齐打，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主力攻进城内，缴了伪军一个团和守卫县公署、警察署、银行的武装，打开监狱解放三百多人，不少人参加了部队，扩大了力量，缴步枪千余只，迫击炮四门，子弹十余万发。这时城外敌人把四门封锁，企图堵死抗联出路，并开动装甲车向抗联部队反扑。勇敢的第三、第九支队的战士们，用机枪和手榴弹打坏了敌之装甲车，集中火力，强夺东门，满载战利品，杀出克山城。这次战斗的消息不仅传遍北满，也远传东、南满，鼓舞了人们的抗日信心，连敌人也不得不被我抗联部队这种顽强善战的英雄气概所折服。

冯仲云同志和周保中、李兆麟等同志一道，坚持抗联的旗帜，一直斗争到东北抗日胜利。文化大革命中，因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被折磨而死。

3 党的好女儿赵一曼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学名李淑宁，参加革命后改名李一超，到东北抗联以后才化名赵一曼。她一九〇五年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白杨嘴。一九二三年入团，一九二六年入党，后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院学习，一九二七年九月去苏联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一九二八年回国，在宜昌建立联络站，一九二九年秋调江西省委机关工作，后又回上海从事革命活动。



赵一曼（1905—1936）

“九·一八”事变后，她被党派往东北，走上了抗日斗争的最前线。先在沈阳满洲省委工作，以烟草公司包烟女工的身份做掩护。不久，满洲省委机关被破坏迁到哈尔滨，赵一曼来到哈尔滨搞秘密工作。她参与组织发动了有名的哈尔滨市电车工人大罢工。之后，满洲总工会机关遭到敌人破坏，赵一曼外出送信侥幸得免。

一九三四年后，赵一曼被调到哈东珠河县任中心县委委员、铁北区区委书记。她深入乡村与群众打成一片，经常给老乡讲抗日救国道理，还帮助老太太纺线，搓玉米，帮助年青妇女烧饭，看

孩子。这样，很快地把群众发动起来，做军衣、军鞋，组织他们站岗放哨，有力地支援了哈东区的游击战争。为对付敌人扫荡，她组织大家坚壁清野，组织青壮年成立自卫队，带领他们积极操练，并在左撇子沟搞了第一次伏击，把敌人杀得七零八落，只逃出两个敌兵。自此铁北区的武装斗争迅速开展起来。

一九三五年冬，党调赵一曼到抗日联军中工作，担任抗联第三军第二团政委，与团长王惠同一起带领战士们在零下三十几度的严寒中出没在黑龙宫、秋安屯，关门嘴子一带，坚持游击战。在紧张的战斗中，赵一曼十分注意爱护战士，常坐在他们中间讲革命故事，使战士们受到深刻的教育。夜深了，战士们都睡下了，她还来回查铺，稍有空隙时间，她就给大家缝补衣服、袜子。战士们都很爱戴她，尊敬她，亲切的叫她“我们的女政委”。

后来，二团奉令回铁北，配合主力作大规模出击。由于日本“讨伐”队的杀、烧、掠，游击区被破坏，抗联的给养成了问题，不少战士在暴风雪中穿单衣行军，有的在单衣外面裹几块树皮，用草绳缠起来就算是最暖的衣服了。几天，也吃不到一粒米。他们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又被“讨伐”队主力包围了，敌人有六百多，而他们只有二百人。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血战一天，打垮了敌人六次冲锋，自己也伤亡很多。赵一曼与王惠同决定突围，她主动要求留下来掩护。在战斗中，她负了伤，左手腕被打穿，左腿膝盖被击断，左臀部也负了重伤。第二天突围以后，她和战友们在候林乡小西北沟又与敌人遭遇。一个同志被打死，她与另外两个同志被敌人押往珠河。下车时，下半身全被血染红了。残暴的敌人“根本不加包扎，反倒用手使劲捏她左手腕的伤口，进行讯问，她的回答只是陈述日军的暴虐”^①，经过几次

^① 见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藏东北地方史资料。

讯问，又陪了法场，眼见王惠同同志英勇牺牲，更激起了她的无比仇恨。

敌人又把赵一曼押往哈尔滨伪警察厅，特务头子想从赵一曼口中了解抗联部队调集到松花江下游的行动意图与党的基层组织情况，对她软硬兼施。先是好言相劝，接着是吊打鞭抽，用竹签子扎指甲等酷刑折磨她，这一切都摧毁不了赵一曼的革命意志。敌人从她嘴里得不到任何东西。她只是表示：“宣传反满抗日思想，开展反满抗日活动，这就是我的目的、主义和信念”^①。无奈，敌人把她暂时送进医院治伤，但常来病房审问，急切地想知道抗联的动向。赵一曼还是不加理睬。敌人把她从床上拖下来，用皮鞋尖踢她的头，用竹棍子打她的伤口，弄得她的伤口好了又坏，反复地遭受折磨。赵一曼宁死不屈的崇高品质，深深地教育了看护韩勇义和其他医生与护士们，连看守警察董宪勋也被感动了。董宪勋听说日伪要处死赵一曼的消息时，连忙跑来送信，并与赵一曼、小韩一块研究逃跑的办法。第二天，六月二十八日深夜十一点，他们乘汽车来到离哈尔滨三十里的阿什河，天快亮时到了金家窝铺，傍晚雇了一辆大车奔往游击区。眼看只有二十里地时，敌人的马队追上来了。于是又被押回哈尔滨。在酷刑拷问中，赵一曼右膀被刀背击断了，一只手耷拉着，她被解回珠河。途中敌人问她有什么遗言，她只给儿子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替代母亲继续斗争”^②。敌人把她绑在马车上示众，她激昂地唱起了“红旗歌”：

“民众的旗，血红的旗，

① 《满洲日日新闻》1936年5月20日。

② 摘自伪滨江省警务厅致伪内务部警务司报告。

收殓着战士的尸体。
尸首还没有僵硬，
鲜血已染透了旗帜，……
牢狱和断头台来就来你的，
这就是我们的告别歌！……”

特务用枪托打她，不许她唱，她的歌声更加高昂。群众被感动得流下泪来，人们不顾警察阻拦，纷纷拥到车前依依不舍地和这位中华民族的好女儿告别。赵一曼牺牲后，日军为其逃跑一事，专门有一个内部报告，分析检查了他们对反满抗日思想犯的工作。其中透露了对赵一曼思想及其活动的恐惧，报告中说：“目前在哈尔滨警务厅拘留审讯中的韩护士，她仅是短时期内，受了赵一曼的宣传，但她已具有根深蒂固的抗日思想……从这个例子中可以证明赵一曼的宣传是巧妙的，她的感化力量是如何的强大”。^①

四、中、朝、日人民并肩战斗

1 中朝人民并肩战斗

英雄的朝鲜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从一九一〇年朝鲜不幸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开始，朝鲜人民就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在汉城爆发了全民的反日大起义，震撼了日本的殖民统治。“三·一”起义虽然失败了，却进一步唤起了民族意识和觉悟。许多人不堪忍受日

^① 见伪滨江省警务厅致伪满内务部警务司报告。